



近代中国名记者

●主编 夏林根●

福建人民出版社





新闻大学丛书

近代中国名记者

●主编 夏林根●

福建人民出版社



PDF

近代中国名记者

(新闻大学丛书)

夏林根 主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5印张 2插页 356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70

ISBN 7-211-01130-0

G·794

定价: 5.95元

出版说明

四个现代化建设正在促进我国新闻事业的空前繁荣。新闻事业的迅猛发展又迫切需要不断充实和壮大我国的新闻队伍。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学习新闻学的需要，本社特编辑出版这套《新闻大学丛书》。既可供新闻专业师生、新闻工作者和研究者作为教学、研究参考资料，也可供新闻爱好者作为学习新闻学的辅助读物。

这套丛书内容较广，既阐述新闻学的基本原理、方法，新闻事业史和新闻业务（采访、写作、编辑等）及其技能、技巧，也介绍新闻实践中的新观点、新经验，包括国外的新闻业务、传播学等译著，以及系统的新闻参考材料。丛书主要由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教师撰写，也有其他单位新闻工作者的著作，力求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

欢迎读者对本丛书提出意见、要求和建议，以便改进，更适合同读者的需要。

序 一

历史是由众多的人物扮演的，研究历史，理所当然地应该研究人物的活动。杰出的历史人物，由于在历史上有过突出的贡献，有过较大的影响，更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我国史学界历来有重视人物研究的传统，一部二十四史，就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篇幅，是人物传记；和人物有关的谱、牒、表、传，在各个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始终占有较大的比重。

但是，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历史人物的研究，没有得到重视。新闻史人物的研究，尤其不被重视。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新闻史教材和专著，对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报刊政论家、报刊活动家、报刊编辑、记者等人物的研究和介绍，都很不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新闻史人物和名记者的研究，几乎成了禁区。报纸是人办的，然而办报的人的活动，在新闻史上却很少介绍，有一些则干脆不能介绍：资产阶级的报人不能介绍，有这样那样问题和缺点的人不能介绍，被无端地戴上了某种帽子的人不能介绍。一部几十万字的新闻史，除了有关报纸的记载以外，几乎不见有人物的活动。能够幸运地被提名介绍的人，屈指可数。即使有幸被提名介绍了，也叙述得十分简略。这种情况，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发展到了极端。所谓的“牛鬼蛇神”，越揪越多，能够在新闻史中被提名介绍的，更是凤毛麟角。这种

不正常的情况，直到拨乱反正以后，才逐步地得到改变。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学风，不断地肃清了“左”的思想影响，原来的禁区被逐渐冲破，新闻史人物和名记者的研究，才逐渐地受到了重视。近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少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开始致力于新闻史人物特别是名记者名编辑名报人的研究，被重点研究并写出专文加以介绍的新闻界人物，到1985年底止，已有188人。其中，发表在《新闻研究资料》、《新闻界人物》两个刊物上的，就有50余人。不少新闻业务刊物开始设置“新闻界人物”、“报坛人物”之类的栏目，有计划地对历史上的和至今还战斗在新闻战线上的新闻界著名人物，进行系统的介绍。《中国新闻年鉴》从1983年版起，还增设了“新闻界名人介绍”专栏，对我国新闻史上的名记者作每人800字左右的简介，当年介绍了133人，1984年版介绍了140人，1985年版介绍了92人，1986年版介绍了161人；连前已经累计介绍了535人，今后还将以每年100至150人的进度继续介绍下去。近年出版的新闻史专著，也开始重视新闻界人物活动的介绍，被《中国近代报刊史》提名的近代新闻界人物，达1500余名；被《世界日报兴衰史》提名的仅《世界日报》一个报纸的著名编辑记者，就有57名；其余如《大刚报史》、《大众日报史》等个别报纸的专史，也都设置了专门的章节，重点地介绍了为这些报纸作出过特殊贡献的人物。有关新闻界名人传记的编写工作，这两年也在加速进行。已经脱稿付梓的有《史量才传》、《张季鸾传》和《名记者范长江》，即将完成的还有《邵飘萍传》和《邓拓传》。正在编写中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卷》也将为100个左右的中国新闻界人物设立条目，作出介绍。新闻史人物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近代中国名记者》，是新闻史人物

研究的一项新的成果。和已出版的各式各样的新闻史人物传记比较起来，这部专著有以下的一些特点：一、覆盖的面比较宽。被集纳到这部专著里来的四十几个人物，涉及的方面很广。既有蜚声中外的已故的新闻界耆宿，也有至今活跃在新闻工作第一线笔耕不辍的新闻界老战士；既有擅誉于旧中国报坛的资产阶级报人，也有来自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革命新闻工作者；既有杰出的报刊活动家、报刊政论家和杰出的报纸编采工作者，也有杰出的新闻学者、新闻教育工作者和杰出的报业经营管理工作。总的人数虽然不多，却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二、内容比较翔实。凡是健在的人物，一般都向传主本人进行过采访，掌握了不少第一手的材料，脱稿后，还请本人过目，加以审定。已故的人物，除了征引权威的文献资料外，还尽可能地约请其家属帮助审查定稿。因此，所叙述的人物经历，比较准确可靠，还补充了不少过去不为人所知的新材料。三、写作的态度比较严肃认真。没有游离无根的道听途说，没有子虚乌有的向壁虚构，也没有欺世媚俗的夸饰溢美之辞，比较实事求是。因此，我认为这是一部有一定阅读和研究参考价值的人物传记专著。作者们的劳绩，是值得肯定的。

阅读和研究历史上的新闻界人物传记，可以丰富新闻史学习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总结历史上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事业各个领域的丰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研究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素质、修养和知识构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上的新闻工作者的成才之道，使青年一代的新闻工作者得到激励和借鉴。更多的这样的专著问世，对新闻史的研究，对青年一代新闻工作者的成长，都将是十分有益的。

方 汉 奇

1986年4月1日于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林园

序 二

随着祖国的昌盛繁荣，以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民新闻事业在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领导下，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天天读报、听广播、看电视的人，一定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吧。

感谢母校老师们的盛情，使我有机会得读《近代中国名记者》的大部份原稿。这些佳作都是与老师们的辛勤灌溉，中青年作者们的努力写作分不开的。使我高兴的是，本书所列的“名记者”中，有我熟识的、现今健在的、尚在发挥余热的老同行；有过去朝夕相见、著作等身的老同事；以及为新闻教育事业不辞劳瘁的朋友们。所以一见到他们的大名，就若故友重逢，欣然把手话旧了。

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里，哪里有什么新闻自由的保障可言！作为二十年代上海《申报》的记者，看到这些文章，不禁使我回忆起一连串的往事，感触万端。在我置身新闻界的二十三年中，风雨飘摇，国无宁日。无产者茹苦含辛，度日如年。今天我们翻阅旧报，过去人民的惨痛生活历历犹在目前。若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革命胜利成功，大家除苦难外，还能得到什么呢？新闻自由还不更是一句空话么？

具有崇高理想与卓越才华的“名记者”们是新闻工作者的楷模。珍惜现在，瞻望未来，同时更要牢记过去。让我们把《近代中国名记者》置之座右，包括本人在内，愿与青年朋友们老老实实在地向他们学习，把他们坚贞的信念、光辉的业绩学到手。相信祖国的新闻事业一定会更上一层楼，永远发出灿烂的光芒！

孙 恩 霖

1986年2月10日

导 言

新闻记者是新时代的产儿。他们是在旧的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伴随着新的社会车轮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新闻记者的出现，是在西方大炮轰开中华封建帝国大门之后。当他们的脚开始拿起笔杆的时候，他们的脚便踏在正孕育着巨大变动的大地上。各种社会矛盾正急剧地在聚集、在发展。时代给他们安排的是曲折崎岖、风雷迭起的征程。

中国的封建势力强大而蛮横，活跃在时代前列的新闻记者所受的考验是严峻的。还不要忘记，长期浸润于封建传统的中国新闻记者，发生于自己头脑中的战斗也极不寻常。在历史的长河中，确有不少平庸之辈随波逐流，沉沦隐没，很快被人遗忘。但重要的是，严重的斗争更是锻炼人才的有利条件。我们看到新闻战线上，有大批大批英俊之士，纵马驰骋，披荆斩棘，作出各种有声有色的表演。比起西方国家，中国新闻记者晚出，历史短得多，但是他们所肩负的历史重荷，也许举世无双，他们用血与汗所谱写的历史，其壮丽多姿也足彪炳天下。

中国第一批新闻记者（新闻工作者的通称）诞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香港。他们起先任职于英国报馆，在这里他们接受了

西方文化的熏陶，积累了丰富的新闻知识与报纸工作经验。随后，他们办起了中国人最早一批自己的报纸。他们中较为知名的有黄胜（平甫）、陈葛廷（言）和王韬。

黄胜可说是我国资格最老的报人了。他是1847年我国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之一，因病返港后受雇于英文德法报馆从事印刷工作；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就担任了颇有名气的中文报纸《中外新报》的主编。他的中西学识受到时人称颂。可是，他的报业生涯主要是在西方报馆中度过的，他虽然参加创办了《循环日报》，但很快远适异域，没有参与报务，后来也没再办报了。陈葛廷在开创中国人自办报业方面卓有贡献。他在担任《德臣报》译员、副主笔和中文版的主编之际，就积极筹划出版中国人自办的中文报纸。在他主持下，第一份中国人自办的《华字日报》终于在1872年春天出世。他所主编的报纸开始发出了富国保民的呼声，为一般商业报纸所不及。不过他对报纸工作的改进也是微弱的，并无重大建树，不久出任清廷驻外使节，也脱离了报界。

中国早期最杰出的新闻记者是王韬。在王韬获罪清廷，避居香港的时候，中华大地上战事初平，洋务运动勃起。很多人都沉醉于所谓同治中兴的昇平景象，而王韬却在这表面昇平繁盛下面，看出潜伏着一种不断发展的严重社会危机。他认为解救良策并非“船坚炮利”，而应学习西方致富之道，发展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经济，并由此而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他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虽身在南天，却心怀北阙，遂起而创办《循环日报》（1874年），以鼓吹自己的救国主张。

王韬对我国新闻事业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是我国第一个把报纸作为宣传爱国思想、推动社会进步的舆论手段。他所主编的《循环日报》奠下了我国报业最早的进步传统。他当然超出黄胜、陈葛廷之上。在报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出现这样杰出的新闻

记者，在西方国家也属少见。

王韬对报纸业务所作的某些改革也有重要价值。当时我国报纸普遍忽视言论，有的报纸偶而也登数篇评论时务的文章，但多为零星随意之作，不成一格。而王韬所主编的《循环日报》创刊不久，即每日刊登论说一篇，评论时政，鼓吹改革，影响遐迩，开我国报纸重视政论之先河。他对文章之写作主张“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为我怀之欲诉”。他的政论文章就是遵照这一思想写作的。这就是说，王韬不仅为政论在报纸上争得应有地位，而且为它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导与写作榜样。他在中国新闻文体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差不多与《循环日报》同时，在上海、广州、汉口等地，中国人也办起报纸来，一批新闻记者在中国悄然出现。可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为新闻记者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条件。刚刚起步的近代化过程步履维艰。新闻记者活动于受着封建势力四面包围的社会，而又依附于发育不全的新闻事业。他们中固然也有一些颇具才华，愤时忧国之士，也曾作过一些象抗击外国侵略、发扬民族正气这种深受读者欢迎的宣传，但是，他们身受重压，他们自己那种过于浓厚的旧式文人的气息，使得他们不能担负时代尖兵的使命。

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也出现过一批类似王韬、超过王韬的先进分子，他们具有比前人更为丰实的西学知识，更为敏锐的观察能力。他们更为深刻地看出了当时正在加剧的社会矛盾，不仅提出了经济改革的要求，而且进一步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而郑观应、马建忠、何启、胡礼垣、陈虬、陈炽等人还纷纷宣传西方有关报纸功能的观点，提出以办报来实现改革要求的主张。可是，他们自己都没办报，也不是新闻记者，这表明当时办报是比著书立说更为艰难险阻的事业。

历史没有停滞，更没有后退，它正悄悄地为新闻界英豪辈出时代的到来，进行紧张的准备。正在成长的新一代的报坛骄子，在伺机而动，万木草堂的精英，正整装待发。

维新运动是这个时代的开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震惊朝野。亡国大祸迫在眉睫。清廷统治的腐朽一朝尽露，人们再也不能沉默了。从六、七十年代起逐渐发展的改良主义思想潜流，一下爆发为救亡图存的宏大的维新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斗争方式是和平的，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以言论为自己的胜利开辟道路，报刊成为不可缺少的利器。我国第一个办报高潮就这样形成了。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来景况荒凉、人才零落的报界，忽而聚集起一支容光焕发、器宇非凡的新闻战士。他们中有严复、谭嗣同、唐才常、徐勤、欧榘甲、麦孟华、汪康年、杭辛斋、康广仁、宋育仁等，可以说是人才荟萃。但不要忘记，这里还有一颗巨星，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最为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以新闻记者特有的政治敏感性，抓住时代最为迫切、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给予激励人心的回答。他那平易畅达、波澜起伏、饱含激情的文章，曾使无数人人为之倾倒。他所主编的《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前期），成为时代的旗帜，启发着整整年青一代。他还是卓越的新闻思想家、理论家。他曾发表大量文章，对报纸的性质、作用与功能，报刊的宣传原则与策略，报纸体例、新闻编辑、新闻文体、新闻写作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发，在当时我国无第二人。其内容之丰实，论述之精辟，也属仅见，为我国新闻理论之建设作了重要开拓。至于他对报章体的贡献更为人所周知。可以说我国报刊言论之成为一种新的独立文体，是由他开始实现的。他的那些当代同行，也都是报界一时之俊，功绩卓著，但当时报坛盟主的地位，仍得让给梁启超。至于曾经名噪一时的王韬，与之

相比，更是相形失色。当然，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代表，不能苛求前人。梁启超也并非神人，后人可以看到，他也有着自己的时代局限性。

时代的步伐忽而加速。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还未过去，一个革命风雷激荡的时代又起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应时而起。他们以武装起义为根本的斗争手段，报坛并不是他们的主战场。但是他们也极其需要报刊，要用报刊唤起千千万万群众，加入推翻清王朝的斗争。

维新派记者活动的序幕，是在激动人心的场面中拉开的；而革命派的报坛新秀，却是悄悄地进入自己的阵地的。陈少白、冯自由、郑贯公等第一批记者的出现，很少为人注意。他们自己当时也还没有和改良主义思想划清界限。

革命派记者给世界以震动的首先是章太炎。和他的许多同僚一样，他也是从维新派营垒中杀出来的。他有非凡的历史功绩。对当时严重统治着中国思想界的改良主义思想，对改良派的巨头康、梁，他首先在报刊上发起进攻。他对当朝皇帝光绪所作的鞭挞，更是动魄惊心。由于他和邹容被捕所引起的“苏报案”，教育着成批成批的忧国之士转向革命。章太炎一下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革命大旗开始在中国报界高高升起。

在新闻战线上，章太炎对革命派的又一重大贡献，是他成功地主持了《民报》同改良派《新民丛报》的最后决战。他是于1906年来到日本东京主编《民报》的。当时形势的发展，要求革命派在思想上、理论上战胜改良派，进一步发动群众，为即将开展的起义高潮进行准备。两派报刊这场大论战，是关系到革命发展的至为重要的战斗。当时《民报》可说是战将如云，其中有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宋教仁等人。章太炎一出狱即入选主帅，足见孙中山等对他的重视。他学贯中西，革命豪气逼人，文章所向披

靡，令人神往。在他面前，不可一世的梁启超终于败下降来。章太炎的革命影响当时达到了自己的高峰。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时人颇多议论。但他的辉煌功绩，永彪史册。他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前期报坛的杰出代表，也为世所公认。

两派报纸在日本的论战初停，起义的烈火就在中国大陆上燃烧起来。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革命报人纷赴新的战场。这一阶段，革命派报坛的代表人物是于右任。和前一阶段的报人不同，他的活动地点不在海外，而是在国内的上海；他的任务不是开展理论宣传，而是进行政治鼓动；他出版的不是运转迟缓的期刊，而是能够快速反映局势的日报。这是因为革命形势变了，报刊的主要使命已不是为起义进行思想准备，而是直接配合起义的发动了。

于右任的办报活动就是在起义高潮中开始的。他所主持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以曲折迂回的手法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揭露清廷，激励斗志，为此伏彼起的抗清斗争煽风点火。他把革命报纸的战斗作用引向一个新的高峰。革命报刊的活动中心，一下由东京转向上海，而《民立报》实际成为革命派的全国机关报。这些报纸培育了一批英姿焕发、豪气纵横的新闻战士，他们中有杨笃生、王无生、范鸿仙、吕志伊、徐血儿、宋教仁、戴天仇、马君武、邵力子、叶楚傖、张季鸾、陈其美等人，军容之盛，除当年《民报》的精英外，无与伦比。而他们的领袖就是于右任。

清朝统治被推翻，民国宣告成立，中国的新闻记者，呼吸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新闻自由的清新空气。但是曾几何时，他们一下又被抛入黑暗之中。在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淫威下，一批记者被捕被杀，一批记者趋炎附势，卖身求荣。也有记者在进行零落无援的斗争，一时难成气候。

如果说当时的新闻记者还来不及在政治上作出扣人心弦的表演，那么在新闻业务上却是颇有成就的。这主要表现在新闻采访与新闻报导方面。在专制政策的严重压制下，言论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令人望而却步。报纸转而加强新闻报导，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当时多变的政治局势毕竟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报社纷纷选派“北京特约通讯记者”，一时成为潮流。记者在报导政治新闻方面，一时大显身手。过去我国新闻界曾经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报刊政论家，现在一批以新闻采写闻名于世的记者首次出现了。他们是黄远生、邵飘萍、刘少少、徐凌霄、胡政之等人，而在当时，最负盛名的首推黄远生。

黄远生在短短的四五年内，写出新闻作品四十多万字，热情惊人。他的新闻通讯所以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它不仅能及时传递出人们迫切关心的时局动向，而且还对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作出深刻独到的分析，而它对一些官僚政客的揭露又是那么痛快淋漓。它受到处于沉闷迷惑之中的读者热烈欢迎，是很自然的。他的通讯在写作上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和时事评论巧妙结合，具有强烈的政论色彩。这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因为这两种体裁的结合，正好满足当时政论备受压抑而读者又极需政论的要求。黄远生的新闻通讯还标志着这种体裁的历史新发展。我们知道，我国的新闻体裁开始时往往和文学体裁混合在一起，难以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在清末民初，新闻通讯开始从文学分化出来，走向独立发展的轨道，可是却又出现另一种倾向，即它只是机械地原原本本地罗列事实，单调而呆板。而黄远生的通讯，却注意按事实的内在的联系来反映事实，轻重有当，题旨鲜明，对旧有模式作了重大突破，把通讯的写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黄远生还对新闻采访工作提出精辟见解，是我国最早深入总结采访经验的新闻记者之一。

历史很快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陈独秀。他早在清末就开始办报，从事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斗争；而现在，他是以新时代的思想巨人步入报坛的。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这给他思想以极大的震动。历史的沉思使他顿悟，即在一个为封建思想、封建传统所严重统治的国家里，从西方移植来的任何民主共和体制，都是要改变本来的面貌与性质的。中国现在所迫切需要的不是以往那种政治斗争，而是要在人们头脑中开展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报刊被赋予这种历史使命而活跃于时代前列。

他所主编的《新青年》，成为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这里汇集起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吴虞、周作人等一批思想界的俊杰之士，但主将是陈独秀。他高举科学和民主大旗，以甘愿“断头流血”的大无畏精神，向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思想猛烈开火。《新青年》的隆隆炮声，震撼着古老的中华大地。它曾唤起无数男男女女，挣脱封建羁绊，奔向争取自由民主的疆场。报刊的思想作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陈独秀还将科学与民主精神贯彻到报刊工作中来（编辑部成员自由讨论的进行、刊物上百家争鸣的开展、论辩中说理精神之提倡，等等），开报刊工作一代新风。

随着1920年初陈独秀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新青年》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刊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共的喉舌，而陈独秀则是中共党报的第一个主编。自本世纪初起，陈独秀的报坛经历可说是与时俱进，不过他的黄金时代，却在五四前期。

中国共产党报刊的崛起，开辟了中国记者活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记者一出现，即投入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大革命洪流。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与工农学生运动相结合，南